

一、前言：禪宗史的翻案

談起近代中國學術史，胡適這個名字恐怕無法略過不提。即使在台灣，他的名聲甚至更加響亮。一般來說，年輕時即已「暴得大名」的胡適，能夠迅速崛起的主要事件，乃是鼓吹白話文運動。從文學改良芻議（白話文寫作）到新詩創作，投入新文化運動讓他備受矚目，逐漸譽滿全國。可以這麼說，儘管在胡適之前即有人已提倡白話文，不過在讓這種新的文體廣為人們所接受、甚至大局底定的過程中，胡適無疑扮演了一個難以取代的積極角色。此外，胡適的興趣廣泛，在政治上，曾擔任駐美大使的他，二次世界大戰後堅持自由主義信念，在台灣撒下了日後民主改革的種子。在學術上，無論是中國哲學、古典章回小說考證等方面，他都有讓人不容忽視的重大研究成果。

本研究想要探討的，並不是這些胡適研究者們耳熟能詳的事功，而是他所引發的一個不怎麼起眼的學術公案，即他的禪宗史研究。「不怎麼起眼」一語，在此意指相對於其他貢獻，胡適的這項研究較不受到他的大多數傳記作者們特別青睞。¹相反地，胡適本人不做如是觀，至少在口述自傳裡，他就認定自己的佛教研究是一項深具原創性的貢獻（胡適 2010: 283）。如此看法不乏支持者，否則日本禪宗研究者柳田聖山(1975)沒有必要編出《胡適禪學案》一書，來紀念斯人功業。有趣的是，胡適生前曾感嘆，他的研究在國內少有識貨之人，卻有外國學者（如鈴木大拙）為此專程來訪（柳田聖山 1975: 12）。²

¹ 舉例來說，就連不論文字或思想風格上受胡適影響甚多的作家李敖，就研究者所知，也好像沒有對他的禪宗史研究發表過太多意見。

² 對此，胡適看法似乎過於悲觀，至少，站在文獻學(philological)立場上的 Faure(1996: 98)便指出，承續著他的研究的學者，在日本有鈴木大拙和柳田聖山，在西方有 Jacques Gernet、Paul Demiéville 以及晚近的 John McRae，還有，由於謙遜，Faure 沒提到自己的成就。關於胡適發掘敦煌文獻後的禪宗史研究發展經過，一個簡單但不失清楚的介紹，可參見黃青萍(2007)以及田中良昭(2003)。

引發胡適投入研究的兩個主要事件，以發生時間先後來看，依序是敦煌藏經洞的被發現，以及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下卷的寫作。首先，一位道士王圓籙於二十世紀之交，無意間注意到敦煌莫高窟一個洞壁裂縫後面有物，破牆遂獲得數量驚人的卷軸。隨著極少數文物逐漸流出（就像殷墟甲骨文問世過程一樣），包括 Marc A. Stein 與 Paul Pelliot 在內的各國探險家們風聞而至，競相向王道士購買洞中大半古代文獻，之後分別收藏於大英博物館與法國國家博物館等地。另一方面，胡適於 1917 年學成歸國後，出版名著《古代哲學史》(2008)（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上卷），其內容討論至古代法家為止。在撰寫終其一生並未完成的續篇過程中，胡適的觸角延伸至佛教，但寫到禪宗部分時，他的疑惑愈來愈大，幾至無法動筆。他注意到一事：現存文獻皆產生於宋代以降，這是因為唐代（禪宗誕生時期）關鍵文獻早已亡佚。

爲了考察這段被時代湮滅的宗教史，胡適以兩種途徑克服史料缺陋所造成的困難。一是求助於當年日本遣唐留學生所攜回的手抄本經典；一是猜測敦煌文獻中也許還保存著唐代佛教相關資料（胡適 1975f: 460-461）。1926 年，胡適的機會來了，他以庚子賠款顧問委員身分赴歐，先是在巴黎發現《神會語錄》，³之後又在倫敦找到荷澤神會的《顯宗記》等重要資料。1 年後回程途中訪問日本，得知《六祖壇經》（以下簡稱《壇經》）敦煌本的存在，之後《壇經》的興聖寺本、大乘寺本陸續刊行；種種發現，證明胡適先前的的大膽假設，即現存禪宗材料多半經過「妄改和偽造的手續」（胡適 1970: 1），他果然大幅修正禪宗的歷史面貌：南北宗之間的不和、⁴沒有袈裟傳信說這回事、神會和尚的長期奮鬥與重要性等。⁵

³ 矢吹慶輝最早發現（田中良昭 1996: 33），卻沒有產生類似提問。

⁴ 根據 McRae(1986: 241)的見解，「北宗」、「南宗」乃是神會所創造的用語，在此之前並沒有「北宗」一詞。

⁵ 江燦騰(1996, 2011)提出一個重要假設：胡適的提問是受到忽滑谷快天(1923-1925/2003)《中國禪學史》的啟發，尤其是關於南北宗之爭這個主題。為何忽滑谷快天會有此洞見？這可能與當時社會脈絡有關，即他所屬的曹洞宗（漸悟）與臨濟禪